



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的由来

□ 胡永嘉

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开设有少数民族班次，主要招收来自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干部，多年来为新疆和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少数民族班的办班历史对我们今天继续办好民族班，开展好民族干部教育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1935年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教工人员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于11月10日进驻瓦窑堡。中央决定，立即恢复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首次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担任校长。1936年6月，党校随中央机关转移到保安县，在保安办学期间设置了高级班和普通班，还专设了一个少数民族班，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只有十来人，都是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如王作义、王海民、王占清、潘占云、王占有、李木林等彝族战士。9月，中央党校迁至定边后与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红四方面军带来了协饶顿珠（杨东生）、沙纳、桑吉悦希（天宝）、郭锐、孟特儿（孟托）、罗德干6名藏族战士。之后，红二方面军又送来扎喜旺徐、贺士司、王寿才3名藏族干部，调来祁海天、马占奎、马永祥、马建英、李占荣等十几名蒙古族和回族学员。少数民族班的规模扩大了，共有50多名学员。廖志高担任班主任，马绍良、李养南协助廖志高管理。

少数民族学员基本上都是贫苦出身，许多人认识汉字，有的甚至连汉语也不会讲。董必武和其他教员对少数民族班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要先学汉语、汉字，教员就一字一字教、一句一句讲，直到学员明白基本意思为止。为了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董必武向党校教员和学员反复进行教育，宣传中共中央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方针，党校呈现出一片团结的气氛。

在这些学员入学时，只有桑吉悦希（天宝）、扎喜旺徐、沙纳、孟特儿、潘占云等几名党员，其他大部分都不是党员。党校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加以引导，另一方面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生活上按不同民族特点尽量给予照顾。民族班开设的课程有新文字、汉语、唱歌、自然常识、时事、军事知识等内容，并经常上山劳动。党校文艺汇演，少数民族学员能歌善舞，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中央党校创办的第一个少数民族班，这个班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后来很多都成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1937年中央党校迁驻延安后，少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的部分藏族学员合影 埃德加·斯诺/摄

数民族班得到了延续，课程增加了一些，主要包括新文字、汉语、唱歌、地理、历史、党课、时事、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军事知识等内容。汉语要从发音一点一点讲起，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成仿吾亲自教发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党校把少数民族学员用新文字写的文章给中央领导看，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时事课主要介绍日本、苏联方面的有关情况。文化课不仅帮助学员学习文化基本知识，而且使他们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中央领导和校领导经常到少数民族班了解学员学习生活情况。毛泽东和朱德多次接见少数民族班学员，请他们介绍民族地区情况，留他们吃饭，还合影留念。桑吉悦希（天宝）的汉语名字也是毛泽东亲自取的。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将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民族部，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在延安大砭沟成立延安民族学院，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

1947年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党校暂时停办。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7月，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由刘少奇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地址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马列学院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新中国刚刚成立，1949年11月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

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府提出要“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周恩来也强调，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1950年11月24日政务院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一项战略措施。

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精神，马列学院拟定创办少数民族干部轮训班。

时间来到1954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和第四书记赛福鼎向中央和马列学院写信请求开设少数民族班，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6月份，马列学院先后给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组织部写信报告了新疆分局要求送少数民族干部来学习的问题并获同意。报告中说，我们的意见可在二部（当时马列学院分一部、二部，一部主要培训高中级干部、二部主要培养理论骨干）组织、宣传两班的120人中分配10至15名。投考人员的条件，原则上仍按中央的通知办理，但为照顾少数民族干部可考虑吸收三分之一左右的县主要干部（县委书记、县长），最好能选送懂汉语的人员。之所以有这个考虑，主要是受制于解放初办学条件所限，名额只能在现有人员中调剂。

在各方面支持下，当年9月，马列学院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轮训班开班了。这个班首期38人，编为第15班，简称新疆班，学制1年半，1956年2月毕业。该班开设哲学、苏共党史、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党和国家的政策、汉

语等8门课程，总课时2745小时。另外还安排有参观课，周末到本市参观，寒暑假到外地参观。马列学院挑选优质师资给该班上课，副院长杨献珍也多次亲自授课。10月份，王恩茂、赛福鼎等新疆地区领导人来马列学院看望了新疆民族干部轮训班的全体学员。

根据中央精神，1955年8月马列学院正式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56年9月，党校招收第二期新疆民族干部轮训班40人。1958年9月，党校招收第三期新疆民族干部轮训班学员40人，第一期新疆民族干部理论班37人。1960年4月，高级党校招收第四期新疆民族干部轮训班学员42人，第二期新疆民族干部理论班64人。1962年4月1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与新疆班学员和教员合影，体现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的重视。此后，“文革”期间新疆班停办。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和中央高级党校期间）共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近300名骨干力量。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强调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干部。1978年10月，中组部发出《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各地必须认真落实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民族地区要注意选拔任用政治思想好和比较懂得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

为了落实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有关精神，1980年3月，中央党校决定重新开办新疆民族干部班并归轮训部领导。同年9月，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经中央批准，中央党校又开办了西藏民族干部培训班。党中央和中央党校对这两个班次十分重视，中央领导和校领导经常看望少数民族学员并与他们座谈，关心其学习和生活情况。

从这时起，中央党校的少数民族班进入了正规化、规模化的新时期。截至目前，新疆班已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近5000人，西藏班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近3000人，为中国的民族事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厅校（院）史编辑办公室〕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伟大的红军军事斗争和红色政权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宣传发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来，并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其中包括注重发挥《时事简报》的宣传鼓动群众作用。

中央苏区要求办好《时事简报》

1931年1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保卫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确立了中央苏区的革命中心地位，但也面临着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此后一段时期，红军收复了一些县城，开辟了一些新区，新解放了几十万群众，形势既鼓舞人心，但又严峻复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层意识到发动群众的充分必要性。

当时苏区群众宣传工作基本情况是“农村里头，小市镇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得很远的”。这种现象所导致的情形是“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红军领导层认为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必须改进工作。

为了在革命根据地“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撰写下发了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用以推动中央苏区和新争取区域的群众斗争。

毛泽东亲自指导办《时事简报》

尽管军情紧迫、事务繁多，但是毛泽东依然亲自对办《时事简报》作了细致周密的指导。他提出对《时事简报》的办报要求：一是形式上“不是印的是写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张是大张”“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二是编辑方针上“不做文章，只登消息”，刊登群众斗争消息、苏维埃的活动、红军的活动等内容。有时“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严禁扯谎”等。三是稿件采用上，消息要兼顾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但不是每期要有各种新闻”，可以灵活调剂，“要紧的是本县、邻县这两部分新闻，因为它是群众欢迎的”。四是出版上，三天出一张《时事简报》，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等等，都是非常具体的要求。同时，为支持办好《时事简报》，红军总政治部《红军报》向各级部队各个地区提供一部分内容材料。

关于《时事简报》的作用，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红军做群众工作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武器。同时这种报也可作为识字运动的材料，村中识字小组的组长给那些不识字人指点一番，顺带教他们认读，“既看了报又识了字”，毛泽东认为“真是好得很的办法”。

可以说，《时事简报》的办报特点跟当时苏区群众识字程度、纸张印刷设备缺乏和斗争情形、战争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

《时事简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广泛动员各级组织办《时事简报》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时，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尽管红军总政治部和各军部、师部以及苏维埃各级地方政府都有印刷出来的小字报纸，“不论它的用意是怎样安顿给群众看、给士兵看的”，但实际上有许多下层工农干事依然看不懂，这就无法最大限

宣传联系群众的好载体

——中央苏区时期的《时事简报》

□ 李晓巧

度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反“围剿”的革命斗争情绪。所以，毛泽东郑重指出：“决不能拿了这些报去代替《时事简报》。”并且，他还言简意赅地做了指示：《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白白，看完了爽爽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

可见，《时事简报》最重要的特点是密切联系群众。按照总政治部的通令，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文化部很快都办起了《时事简报》。据党史文献记载，中央苏区的普通群众和战士非常欢迎《时事简报》。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号召办好《时事简报》有其历史的、政治的背景，就其办报本身来说，就是要力戒官僚主义、力戒形式主义。

综合党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倡导充分发动群众的思想一直贯穿于革命战争年代。1929年4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写道：“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深刻地指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动员”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如何改法？毛泽东提出“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涵盖着深刻的群众路线思想，与中央苏区时期办《时事简报》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关于宣传工作的许多指示中都提到“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这样的观点，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宣传领域的重要体现，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功实践，形成“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的革命大好形势，取得了伟大光辉的业绩。

总之，中央苏区红军时期办的《时事简报》为实现苏区人民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投入苏区保卫战，在扩大群众斗争、增强群众信心、鼓舞群众斗志、取得更大胜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中国共产党办好密切联系群众的报刊开了一个好头，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苏轼的“三州”功业

□ 段培华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同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自题金山画像》作于苏轼去世前两个月，是其最后的诗作，也是苏轼一生的写照。至于他为何将被贬谪处——黄州、惠州、儋州而不是政治地位更高，更有作为的其他时期、地点作为自己一生“功业”的代表，历来众说纷纭。

“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苏轼幼年时便已表现出非凡的见识，6岁的苏轼在阅读石介所写的《庆历圣德诗》时，曾向先生询问：诗中范仲淹、欧阳修等名臣的事迹。先生漫不经心地对苏轼说，小小孩童何必知道这些？苏轼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则不敢知道，如果也是人，为什么不能了解？而若干年后，青年苏轼即一鸣惊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皇帝宋仁宗读过苏轼兄弟的文章后欣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无论是苏轼本人，还是时人对苏轼的期许都是很高的，可是世事无常，苏轼的一生，并不如意，大部分时间与贬谪外放相伴。

经历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后历经一贬再贬。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是他仕途最失意之时，也是其文学成就最显著之际。由于被贬三地时不能签书公事，苏轼有充足的时间寄情文墨；贬谪生涯也使他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和人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完成了注解《易》《书》《论语》三部著作。无论诗词、书法、绘画、经学，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正如他本人所说，“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苏轼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写道，“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蹇然不能及矣”。这些都说明贬谪生涯对苏轼创作的影响。

不能致君尧舜，仍不忘“流惠下民”。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贬滴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已经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三地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

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轼在三地仍留下无数善举。了解到黄州当地因贫穷而溺婴，苏轼“闻之酸辛，为食不下”，积极奔走筹划，救活很多婴儿。在惠州，他积极为当地修建桥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儋州，他劝耕种、推中医，兴教育。在《雪堂记》中，苏轼写道：“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他躲避的只是世人的机心，而不是要逃避世上的事情，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

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贬谪岭南儋州时期，苏轼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日子，但是再困苦的生活也没有压垮苏轼，反而使他更加乐观、旷达。在黄州，苏轼“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黄州时，他自号东坡居士。岭南时，他独觉自省，思想更为深邃。乐观旷达、随缘自适让他看起来更为洒脱、飘

